

《天堂内外》:以有情之笔写现实之真

杨 灿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邓宏顺长篇小说《天堂内外》,植根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生活,生动展现农民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变化,巧妙运用对比手法和景物描写表达情感立场,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对农民命运的悲悯同情以及对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殷切期待。

[关键词] 《天堂内外》;农民生存;社会心理;对比手法;景物描写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5-0008-05

In and Out of the Heaven: Describing the Reality with a Sentient Pen

YANG C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Deng Hongshun's novel *In and Out of the Heaven*, which is deep rooted in the rural lif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reflects the farmer's subsistence predicament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 and expresses his emotional standpoint by contrast method and scenery description. Through these words, the writer shows his deep understanding for the social reality, the compassion for the farmer's fate and the expectation for the solution of rural problems.

Key words: *In and Out of the Heaven*; farmer's subsistence; social psychology; contrast method; scenery description

作家邓宏顺主张文学关注社会现实,其小说作品细致探析社会生活现状,从不同角度真实、及时地反映当下农村社会问题。长篇小说《天堂内外》^[1]基于他对农村社会的深入观察,借由湘西农民四阿婆一家稼穡艰辛和颠簸命运,再现风味浓郁的乡村生活,并着重反映农民的艰辛处境及其背后的诸种农村社会问题。小说以其根植现实土壤的发现、描写和深刻的剖析,使人关注、思考并正视农村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 植根现实展现农民的努力与困境

邓宏顺长期和深度关注农村现实,从而能够将最本真的农村社会现实了然于心与手。他的小说

对乡村景象、四季稼穡以及农民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真实而鲜活,能够敏锐地触觉到社会发展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变化。《天堂内外》以四阿婆一家三代人的命运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变迁的缩影,塑造以四阿婆为中心的人物群像,用悲壮而温暖的笔触勾勒不同类型人物的选择、努力与困境,并从而构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宏大历史现实。

其中,四阿婆是善良、勤劳、热爱土地的老一辈农民的代表。四阿婆家一年中遭遇到的种种艰辛,展现了农民处处碰壁的无望,以及农民无法依靠务农过上好日子的悖谬和遗憾。

四阿婆相信国家出台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相

信拥有土地、勤劳耕作就可以获得幸福生活。所以,她响应乡里张书记号召,种烟致富。因村里人大多进城打工,灌渠荒废坍塌无人整修,四阿婆没钱租抽水机,只好和儿子一起担水,累得生病。可是秋天丰收时烟叶却降价了,半年多劳动所得还不如环卫部门罚款高。四阿婆愤怒地在河边点燃烟叶,烧掉半年的汗水和希望。种烟失败后,四阿婆寄希望于稻子的丰收。辛苦一年,到秋天才发现买了假种子,稻子失收。种子站老板不肯赔偿损失,儿子超美因为打了林老板一耳光,反被打成骨折关进治安联防队。这时,乡里的干部来收粮收钱。四阿婆没能力缴税,面对乡干部的思想工作又羞又愧,只好让乡干部把电视机抬回去抵押。为了凑足乡里费用和孙女的学费,她将原本政府承诺归自家的木材拉去卖,却被检查站没收木材,拘留15天。四阿婆一家勤恳耕作、听从乡干部的指导,然而一年的努力终究落空,辛苦一年却交不齐孙女的学费,欠着乡里的税费,甚至没钱过年。

所谓“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的人,包括以种植业、畜牧养殖业、林业等自然经济产业为职业的人。然而,超美气愤地说:“遍体绮萝者,不是养蚕人!凡是守着土地的,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四阿婆绝望地对虎子说:“我还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你说,还有路在哪儿?”

由于务农的艰辛无望,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求生。对于进城务工潮,邓宏顺写出了农民的迫不得已、在社会变迁中的无所适从。作者在小说中借张解放之口说道:“如果农民收着自己的田地还不愁过上好日子,谁愿意这么丢儿弃女哭哭泣泣地背井离乡啊!”

超美、大和夫妻便是无奈之下走向城市的代表。秋兰进城后做起了出卖肉体的生意,她在面对超美的愤怒时孤注一掷地说道:“你不要杀我!不能杀我!我死的时候会自己回来的!我还有事没做成!”她要做的事就是留给子女进城的资本,直到染病快要去世时她才带着给儿女的两个存折回到洪河。茶花因要告发张文革和娱乐城的老板通过殴打和强暴逼迫打工的姑娘卖淫而被残害,失去双腿。她在梦里回到家乡,她对大和说:“我要先哭哭,你让我先趴在这牛身上哭哭!”更是一语道尽对家乡、乡村生活的眷恋不舍和对离乡背井的不愿。最深爱母亲和土地的大和为了攒钱给孩子交学费、买化肥、寻找失踪的妻子,最后也放弃务农到煤矿上打工。他死于煤矿事故后,却因为煤老板有靠山

而讨不回一个说法。

与此同时,作者也写出社会环境变化给人的思想和心灵带来的巨大改变。

张文革是洪河最早走向城市的人,他认为没有土地才自由。在他看来,“这年头弄得钱到手就是真本事”。为此,他将乡亲、侄女带到夜总会里上班。即使亲侄女染上毒瘾,他也没有感到一丝愧疚或羞耻。而尽管清楚张文革招的是什么工,很多村民仍旧把女儿交给张文革带走。四阿婆想起自己十五、六岁时在洪江青楼做过的那些事,就劝这些大人不要把姑娘这么送出去。村民却回答说:“养女百岁还是人家的人。这年月,留得清白又当不得饭吃。”四阿婆的孙女桂兰是混沌进城并迷失于此的年轻人代表,她也在张文革的娱乐城“打工”,染上毒瘾,回乡后精神混沌、身体虚弱不堪。而洪河像桂兰这样的年轻人不止一个。“从城里回来染上毒瘾的男女天天在一起鬼混,身体一天天瘦得风吹即倒,还又偷又抢,动不动就要打架杀人,甚至不认父母兄弟”。

村里人进城后的经历告诉四阿婆,洪河人不能毫无准备地踏入城市:“我们洪河到城里打工的女人,就因为找不到文化就找不到好工作;有的农村姑娘进了城,没法谋生就做那些不光彩的事。现在农村人都想进城去,其实没有文化的人进了城,不仅是自己的日子不好过,还把城里名声弄坏了。所以我一定要让三个孙女读够了书再到城里去。”但经过烟叶降价、稻子失收、木材被没收,四阿婆辛勤劳作一年仍不能凑足二兰、小兰的学费。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导致四阿婆眼睛失明。对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培养孩子读书进而追求好的前程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即使完成高等教育仍然难以获得同样的机会。孙女大兰虽然辛苦完成大学学业,却找不到工作,最终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被人杀害。

作者通过对不同类型人物选择和命运的描述,勾勒出大环境下农民的处境和各种生活形态。四阿婆一家三代通过辛勤耕作、进城务工、读书找寻出路的努力都失败了,似乎显示出悲剧性的宿命。但不幸并不是邓宏顺笔下农民命运的必然。如小说《乡村博士帽》中的米嫂子,就通过点滴经营计划逐步过上好的生活。在《天堂内外》中,四阿婆一家所遭遇的问题是作者有意识地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处理。对遭遇不幸的个体而言,这些事件是偶然的,而某些社会问题的客观存在导致农

民遭遇不幸,则是必然的。小说塑造人物悲剧命运的目的,在于揭示造成人物不幸命运背后的必然因素。

二 社会心理和潜规则的深刻揭示

邓宏顺的小说敏锐地捕捉社会发展进程中细微的变化和各种社会角色的心理活动,多维度地描绘基层生态,建构丰富多元的乡村世界。比如,小说《活法》描写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思想和心理上的不适应,《吉祥白鹭》描写打工潮中乡村的荒芜以及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饭事》描写官场中的微妙关系和潜规则,《快乐乡官》描写农村基层干部工作中的快乐与苦闷,《有为为官》描写的是农民父亲与干部儿子观念上的冲突。长篇小说《天堂内外》则整合了作者多年来对农民、农村基层干部、进城务工者、商人等社会角色的观察,围绕四阿婆塑造了各类人物形象,对其心理活动和行为模式有真实入骨的描绘,并在此基础上展现真实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从而揭示造成农民悲剧性命运的社会必然因素。

首先,在《天堂内外》中,作者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命运进行观照。“农民”不只是一种职业,更是代表一种社会阶层。小说中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当下农民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四阿婆家买到假种子,毁了一年的收成,种子站林老板却因为有靠山,有恃无恐地不予赔偿;超美打了林老板一耳光,林老板却用关系打折他的骨头关进治安联防队;政府动员农民将大雪压倒的树木拉回,承诺可自用、可售卖,可是当四阿婆为了给政府交纳费用决定卖木材的时候,却被检查员没收;四阿婆咬伤检查员需要拘留,却因为怕耽误阳春而不能追究检查员的责任。在这些事件中,农民都处于有道理无处分说的景况,表现出在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社会环境的变化给一些人带来了机遇,但由于知识储备不足并缺乏引导,农民反而处于被动。“在土地上种庄稼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与土地和庄稼有关的事情被不种庄稼的人弄得很复杂,很深奥;复杂得让农民理不清头绪,深奥得让农民看不到底地!”乡干部号召农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可是农民还没把握不到市场经济的规律,却发现人心已经随着市场经济发生变化。乡下用于灌溉的水渠无人整修,只能付钱请人灌溉,没有钱就没有肥料和灌溉用水,农民的劳作愈发艰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粮食增产后却降价了,草烟也变成

一毛五一斤,农民付出劳动却不一定获得对等的收入。

农民即使走出乡村,其身份、生存状态、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也仍旧属于这一群体。他们在城市中也并没有得到尊重和与城市人同等的机会。如秋兰夫妻,他们打工的工厂专门赚进城农民的钱,二人工作后不但没有拿到工钱,反倒连交付的押金都赔进去。无奈之下去贴黑广告,又因为违反城市管理规定被抓。作者这样描写农民面对城市的无力和无奈:“城市真实个营养很好的鸡蛋,从乡下进城的人就像蚂蚁,钻不进鸡蛋里面”。

第二,小说从基层干部的心态和角色认定切入,在制度的层面解读农村问题。小说多次通过对话描写基层干部的心态,解析现实中农民、干部、基层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揭示农民利益在基层政府机构的运作中被消耗的制度原因。

基层干部的工作服从于部门利益和上级领导,因而“农村干部说起来是在做农村工作,实际上都是为官方工作,不是在为农民做事”。他们更多考虑部门和自身的利益,而非主动思考农民的需要、维护农民的利益。对于农村干部来说,与农民打交道只是年复一年的重复工作。他们号召农民“响应政府号召”致富,却没有为农民指出正确有效的致富之路。乡书记大肆号召农民种草烟,导致四阿婆半年的劳作化为烟灰。在四阿婆失望无措的时候,乡书记正在酒店推杯换盏。面对四阿婆的求助,他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反而抱怨自身的处境,以无用的官话和伪善的安慰劝退四阿婆。

小说中,乡政府没有为农民谋利益。相反,乡政府自身的消耗还要出自于农民。他们无力指导农民致富,却在向农民收费解决乡政府开销问题上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先闲聊国际大事,再问收成,然后拿出红头文件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当收费遇到困难时,先说自己的难处和不得已,让农民卸下心理防备。然后以讲政策,讲觉悟,假意热心地帮农民借钱缴费为幌子搪塞、欺骗乡民。所以,刚被假种子坑害、因烟价大降而一筹莫展的四阿婆,又被乡干部搬走了电视机。对此,乡干部也在同四阿婆的交谈中抱怨道:他们想办的事儿没钱办,不想办的事儿又非办不可。凡县长同四阿婆说:“乡里和尚多了,要发工资,发补贴,发奖金,没有来源就想这鬼主意!现在政府变成了收费的政府,收了费养人,养了人又收费”。

基层部门里人浮于事,而陶乡长这样真正为农

民谋福利的干部却得不到体制的承认,他参加工作多年却仍旧无法解决编制和工资问题。洪河人唯一一次致富的希望是在乡长陶金的带领下种植早熟高产蔬菜。但是,洪河种植高产蔬菜的成功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媒体和参观者,接待费用成为乡政府的大困扰。然而省掉这部分支出就会疏远那些决定自己仕途的人,就是断送升迁前程。为此,乡领导想到在进乡的公路卡子上设收费站,购买蔬菜的车辆均需交几十元。收取的费用除去接待费开销,可用于给乡干部发奖金和补贴。收费站的设立使购买蔬菜的人潮迅速减少,菜烂在了地里。在农民和派出所的冲突中,陶乡长意外中枪去世,种植高产蔬菜的事业也以失败告终。农民乡长陶金费尽心力指导农民创收,却彻底毁于基层部门的私利。部分基层政府部门和农村干部的角色认定错位、不以农民利益为要,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除了制度原因,官场斗争和权力腐败也对农民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小说塑造了两位切实为农民利益着想的干部:陶乡长和凡县长。他们在开展工作的同时,仍要与政府部门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和斗争。在设立收费站的问题上,陶金与老易针锋相对,而张书记则是采用平衡的官场手段消弭问题,因而没能阻止大祸的酿成。带领农民致富的努力最终被权力斗争和腐败消耗殆尽。陶金是中国农村最需要的基层干部,他对农民和土地有深切的热爱,对农村社会问题有深入的思索和探寻,坚守村干部的立场和本分。这样一个农村干部得到了农民的爱戴,却总是被老易挟持,被林三奚落。最终,陶乡长因公丧命,凡县长因触犯他人利益而卸任。

由于权力腐败,农民的利益受到了巨大损害。农村干部随身携带的红头文件作为权力的象征压在农民头上。因为手握权力,林三卖假种子且不予赔偿,不惧农民的愤怒。在农民和乡政府关于设置收费站的争执中,林三对老易所说的:“姐夫,你可要为我出口气啊……你要再不抓几个人,这摊子就无法收拾!”这段话充分说明他对于权力依仗和嚣张,以致农民们意识到的:“现在这些有点权力的公家人,你只要给他们划破点皮,他们只怕都可以整得人剥皮脱壳!”

邓宏顺选取农民的视角描述各色人等的思想和行为,以大量的心理活动和人物对话进行农民苦难的独白和对农村社会潜规则的揭示。通过具体事件中各种人物角色的处理方式,毫不留情地揭露

农村基层社会的种种弊端和悖谬。

三 运用对比手法和景物描写表达情感立场

小说围绕四阿婆一家的经历展现社会现实,作者并未对社会问题和各色人物行为心理直接做出评断,而是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和饱含情感的景物描写揭示其荒谬,表达作者的情感倾向、价值判断。

对比手法的运用更尖锐地揭示了世事的悖谬和作者对四阿婆一家的同情、对社会现实的失望。

首先,小说将农民分得田地时的欣喜与当下田园荒芜的现状进行对比,提出农民无法依靠土地谋生的悖论,这是小说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的矛盾。

在四阿婆和虎子这一辈的农民心中,好的生活就是家庭兴旺、幸福,而拥有好耕种的土地和好生养的女人是获得兴旺、幸福生活的充分必要条件。虎子甚至为了分得一块百石丘的田和娶四媳妇做老婆,放弃了给王区长做通讯员的“前途”。这不仅是虎子的想法,也代表了一代农民的普遍观念。小说里描写了农民最初分得土地的欣喜心情:“不要一分钱就能得到田地的人们梦一样地笑着,跟在土改工作队后面……抓了一把百石丘软软韧韧的肥泥土,搓成一个圆团,在鼻子上闻了闻,闻出了一种香甜。”“田畈上已经有人使唤着耕牛在河边天地里翻犁刚刚分到的土地,把赶牛鞭扬得很是扬眉吐气”。

然而对土地的信仰屡屡被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所打破:“如果在前些年,此时本应是个很热闹的黄昏:他会像很多男人一样,扛着弯弯犁从夕阳里一晃一晃地都近来,日光在亮闪闪的犁口上跳动很多很多的银环;人赶着的牛,一边走一边嘴巴歪歪地吞草饱自己的肚子;还有狗跟着牛后面对那些它认不出来的人说着不好听的话语;女人这时候就总要把饭菜端出来放在当风的屋门口晒谷坪的小桌上,还给他添一碗包谷烧;他喝酒的时候,女人和娃儿就会在月亮和星星的照看下说着洪河泥味儿的童话,还有关于年成,关于阳春,关于女人,关于孩子,关于城里和乡里,关于近处远的事情……那时候,人们都醉在田土的丰收里,醉在一种亲情里,醉在一种乡情里,醉在一种热闹里;而现在的洪河不是那样,所有漂亮的女人,有男人的没有男人的,几乎都属于城市,村里该回来的人没有回来,田地开始出现大片的荒芜,村里的热闹都跑进城里,留在乡村的只有冷清和茫然的疑问。”

这一段对今昔对比表现了农民乃至作者对传

统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肯定和浓厚的怀念。依靠土地生存的理想朴素而简单,然而在经历政治运动和依靠四阿婆靠身体换粮食的艰难岁月后,四阿婆一家靠勤恳耕种改善生活的时光非常短暂,很快他们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茫然无措。农民大量涌向城市谋生,田园荒芜。“茫然的疑问”展现的是对农民不再靠土地谋生这一转变的不可理解,这种鲜明的对比必然引发读者对其背后原因的思索。

其次,小说亦将农民的勤劳善良与其不良境遇进行对比。

主人公四阿婆虽然接连遭遇不幸和不公,但仍然保持着善良和希望。尽管辛苦一年没有收成,可是她仍然愿意体谅乡干部的处境,对自己不能按时交税交费感到羞耻。为了给政府交费,她甚至将留给孙女做嫁妆的木材拉去卖。乡书记的错误宣传导致四阿婆白白浪费了半年的劳力,她也仍旧愿意相信和体谅他的苦衷。四阿婆性格要强,她不要大和的安抚费,不接受乡里的救济,而是要靠劳动换取生存。作者塑造出一个坚强、自尊而苦难的农村母亲形象,因其善良、坚强,她所承受的失去亲人的痛苦、不公正的待遇、处处碰壁的绝望更能引起人深切的同情和愤慨。

再次,小说借由四阿婆进城的经历叙述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生活的巨大差距。

县政府里很多肥头大耳的人急匆匆地来去,每一个都好像当大官的样子。县城里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踏歌起舞,而洪河这个年纪的老人还在种田收稻子。城里的孩子买零食吃得脸红如花,四阿婆想到自己孙女的可怜,热泪在眼眶里打转。小说里这样描写四阿婆的感受:“当初她从洪河到县城时,惊叹过县城的热闹;从县城到市里时,她惊叹过市里的繁华;从市里到省城的时,她惊叹过省城的高楼大厦;现在到了北京,她才明白世界上还真有这像天堂一样的地方。她站在大街边想起她遥远而可怜的洪河,想起洪河那大批大批的天地和在田地里追赶着、怪叫着的狗群;想起洪河边的墙壁上那些月光下白亮的石灰标语;她想起从城里到洪河又回到洪河停车坪里送别她的那些洪河人。”作者未加评断,而读者却能读出字句里浸透的辛酸。

在运用对比手法对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的同时,小说也以饱含情感的语言对乡村景象、动物和人物心理活动进行大量的描写。

小说中饱含情感的景物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主

人公的喜爱、同情和悲悯,充满着对乡村生活方式和景象的喜爱。作者满怀趣味的描写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明媚的眼光下,犁坏间闪出一排又一排水花。一声又一声的吆牛声,在春雾里湿润润地响起又消失。没有犁倒的草子花是耀眼的紫红,犁倒的就变成一片银亮的水镜;在水镜里,可以读到天上的飞鸟和云朵。微风吹起涟漪,被强行犁翻出来的水虫就在涟漪上泅渡逃命;人们要耕耘春天了,由不得他们还想冬眠。”

小说中一草一木、鸟鸣犬吠都蕴含着人物的悲喜情愁,细腻、准确地渲染人物感情。在邓宏顺笔下,庄稼和动物都是农民的伙伴和家的象征,它们陪伴着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当四阿婆要离开洪河去北京告状的时候,她眷恋不舍地“把油麦锄上一遍,施上一次冬肥;庄稼也是她的儿女,她要让庄稼在冬天里暖和,她要在冬天里把庄稼喂肥。土地没有对不起她,庄稼没有对不起她,她不能让庄稼跟着她吃苦!”大段关于乡村景象的描写表现了农民对乡村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象征着农民乃至作者对乡土和传统乡村生态的喜爱和眷恋,同时也表现出被迫背井离乡谋生、告状的无奈和沉重。

大量对比手法和景物描写的融合,表达出作者强烈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引导读者对农民的感性认知、真切同情和对现实的理性观照。

邓宏顺曾在小说中借由主人公之口,批评当下的一些作者不能够真正深入农村,观察和表现农民真正的生活。有别于此,《天堂内外》整合了作者对农村社会现实和各类型社会角色的长期观察和认知,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农村社会生活面貌。小说以情感作为创作的源动力,以悲剧性情节集中反映社会问题,饱含情感地表达作者对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怀恋、对农民的尊敬和同情,并进而引发读者对农民命运的悲悯、对农村社会现实的关注,使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有可能借由文学作品形式广泛地得以正视和解决。

参考文献:

- [1] 邓宏顺. 天堂内外[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黄声波